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游龙波 张诺夫 温敬元 徐 彬 著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与

党的执政基础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与党的执政基础研究/游龙波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769 - 9

I. ①中… II. ①游… III. ①社会阶层—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②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建设—研究 IV. ①D663②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941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王 琪
责任编辑 武 云
责任校对 范丽雯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92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这种新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对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执政党建设问题，就不能不研究党的执政基础。这不仅对于系统总结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巩固执政基础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在实践中化解我国由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带来的党群之间、干群之间和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一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游龙波等同志撰写的《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与党的执政基础研究》这部理论著作，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党的执政基础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该成果对执政基础的研究有新的突破和进展，因而鉴定等级为“优秀”。综观全书，其突出的特色主要体现在：（1）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正如作者所说，党的执政基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研究党的执政基础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本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执政基础的三维结构理论，即从制度形态、观念形态和社会形态等三个维度来建构和把握党的执政基础，并系统分析和论述了执政党执政基础的结构与要素。这个观点颇为新颖。（2）拓展了研究领域和内容。本书以党的执政基础三维结构理论为分析框架，深入分

析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党的执政基础带来的广泛而深远影响。同时,从三个维度提出了新形势下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对策与思路。全书资料丰富,内容深刻,提出了许多给人启迪、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观点。(3)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本书打破了传统的“就党建谈党建”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和党的建设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注重从学理层面阐述“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党的执政基础”问题;运用调查问卷和实地考察的方法,并用社会学统计软件 SPSS 对问题进行统计与分析;将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做到有理有据。(4)结构框架完整、内容丰富。全书分导论、上篇、中篇和下篇四个部分。导论从制度形态、观念形态和社会形态等三个维度系统分析和论述了执政党执政基础的结构与要素。上篇系统阐述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现状、背景及其特征。中篇从执政体制、组织结构、公共政策层面,思想、价值、文化层面,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层面,深入分析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党的执政基础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下篇提出了新形势下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一系列对策建议,为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此外,还介绍了国外一些执政党巩固执政基础的主要做法与启示。

该书是党建研究领域的又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价值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学术价值。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是党建学科必须研究和探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虽然有不少研究,但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学理性还不够,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本书构建了对执政基础研究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而且运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交叉学科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学理性和学术性比较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提升了党的执政基础理论。从这一层面看,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二是应用价值。当前,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加速演进,党的执政基础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本书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党的执政基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提出了一些带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办法与思路,为解决党的执政基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决策参考。从这一层面看,本书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三是方法论价值。本书力图打破传统的“就党建研究党建”方法,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党的建设等多学科方法分析和研究在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问题。这

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党建研究方法，从而为更好地研究解决党建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有效的“桥”和“船”。从这一层面看，本书具有较高的方法论价值。

总之，这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是关于执政基础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我对它的出版表示由衷的祝贺，并愿意向大家推荐。当然，该书有些观点不无可以商榷之处，有些问题的研究也有待深化，希望作者今后继续努力，以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卢先福

2012年10月20日

目 录

导论 执政党执政基础的三维结构分析	(1)
一 制度形态维度:执政体制、组织机构和公共政策	(2)
二 观念形态维度: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	(7)
三 社会形态维度: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15)
四 制度形态、观念形态和社会形态三个维度的辩证关系	(20)

上篇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第一章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现状	(27)
一 工人阶级的变迁	(27)
二 农民阶级的变迁	(29)
三 知识分子的变迁	(30)
四 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与发展	(31)
第二章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原因	(33)
一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调整	(33)
二 经济、政治与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	(34)
三 科技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36)
四 工业化、城镇化的影响	(38)
第三章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特征	(39)
一 社会阶层构成由同质向异质转变	(40)
二 社会阶层流动由封闭向开放转变	(42)
三 社会阶层认同由他者向自我转变	(45)

2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与党的执政基础研究

四 社会阶层利益由抽象向具体转变	(49)
------------------------	------

中篇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党执政基础的影响

第四章 执政体制·组织机构·公共政策层面的影响	(55)
一 党的领导和执政体制的演进及面临的挑战	(55)
二 党的组织结构面临的影响	(63)
三 党的政策演进逻辑和面临的挑战	(69)
第五章 思想、价值、文化层面的影响	(75)
一 观念形态维度与党的执政基础	(75)
二 观念形态的神圣化与世俗化	(85)
三 观念形态的同质化与异质化	(99)
第六章 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层面的影响	(106)
一 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106)
二 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123)

下篇 新形势下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对策与思路

第七章 完善党的执政体制与提高党的执政绩效	(143)
一 完善党的执政体制	(143)
二 提高党的执政绩效	(164)
第八章 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巩固党执政的观念形态基础	(176)
一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和权威性	(176)
二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182)
三 提升公民的政治心理素质	(187)
第九章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192)
一 建立和健全党的利益整合机制	(192)
二 改革和完善群众的政治参与制度	(200)
三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	(209)
四 需正确处理和把握的其他几个问题	(221)
第十章 国外执政党巩固执政基础的主要做法与启示	(227)

一 国外执政党巩固执政基础的主要做法	(227)
二 有益的启示	(242)
参考文献	(247)
附一 调查问卷	(254)
附二 问卷统计结果	(258)
附三 调研提纲	(270)
后记	(275)

导 论

执政党执政基础的三维结构分析

党的执政基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学界对此的认识也多种多样。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认知方式。广义的认知方式大多认为党的执政基础包括党自身的支持性条件和赖以存在的社会性条件两个方面，但它们的视角却各不相同。以蔡长水教授为代表，他从哲学关于事物主客体划分的角度出发，将执政基础分为主体的范畴和客体的范畴两个部分。在他看来，主体范畴主要指执政党自身的状况，包括执政党的阶级和群众基础、成员构成、组织形式等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政权的根本性质和行动方向；客体范畴主要指执政党执政的综合环境，属于包括执政党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和特点，它是执政党制定指导路线、纲领、政策和执政模式的现实论据。^①此外，有学者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划分的角度出发，把执政基础分为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思想文化基础、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等。^②狭义的认知方式主要是从政党成员构成、所代表阶级阶层或者所依靠力量的角度，认为执政基础主要是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应该说，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都有其合理性，它们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了执政基础的某些特征，概括性地说明了执政基础在政治实践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或重要现象，促进了人们对执政基础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在借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所谓执政基础，就是政党领导和执掌国家政权所必备的支持性条件。这些条件必须满足政党巩固其执政地位的根本需求，内源于政党形成过程中自身的资源状况和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① 蔡长水等：《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② 王继元、赵子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研究》，《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

可以从制度形态、观念形态和社会形态三个维度进行建构和分析。

— 制度形态维度：执政体制、 组织机构和公共政策

制度形态维度的执政基础主要是指执政体制、组织机构和公共政策，它为中国共产党有效增强其执政基础提供了制度性安排和坚强政治保证。正如李普塞特指出的，一个国家的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现实表明，有效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整合，必须依靠民主政治制度来进行安排和运作，这对于建立社会认同系统并发挥实际效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执政体制

执政体制，指的是构成执政活动的各个要素间的组织制度及其关系。由于现代执政活动一般需要政党、国家和社会三大要素构成，因此，执政体制涉及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与社会、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在中国，执政体制是指中国共产党主导和推动其他政治主体之间所形成的政治关系体系，包括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党与民主党派及党与自身政治系统的关系。从党的执政基础来看，执政体制具有以下功能。

（1）执政体制是执政党政权运行的保障性力量。政权运行不可能在真空状态下进行，它必须依附于一系列制度性要素。执政体制以执政的制度化安排为基础，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规定了执政党与其他政治主体的关系，对各个政治主体的政治地位、组织与运行原则、活动程序、方式和技术手段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为执政党政治权力的行使与实现确定了必要的准则。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②因此，执政体制不仅为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

① [美]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行为提供了运行的依据,而且使执政党政权运行通过体制权威的作用而体现出来。换言之,执政体制对于党的执政基础而言也是一种制度保障与推动力量。

(2) 执政体制直接形塑着执政主体的执政人格。执政主体的执政人格并非天然生成,而是在执政实践中逐步培养和锻造的结果。正如弗洛姆指出的:“一般个人的整个人格均由人们相互关系的方式所铸成,它取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达到的程度。”^① 执政体制一旦形成和确立,实质上就成为一种在客观上制约、影响该国所有公民思想和行动的强大的体制环境。这种体制环境因其超常的稳定性和强大的刚性制约力,会对置身其中的执政主体的执政人格形成无形而巨大的导向,产生塑造功能。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众多颇具特色的体制性人格。因而,在长期浸染熏陶和影响下,执政体制上的或完善或缺陷,自然会形成实质上折射体制的执政主体执政人格的或完善或缺陷,从而大大影响到执政党的形象,进而影响到执政党执政基础的巩固。

(3) 执政体制影响和制约着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执政体制作作为一种受国家强制力维护的制度模式,它不仅形塑着执政主体的执政人格,而且对普通民众的生存发展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自然而然地会引起民众复杂的心理反应,其中包括民众对执政党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也即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执政合法性。一般而言,科学、合理的执政体制会因其内含的民主与法治精神及其所带来的发展绩效而大大激发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认同;反之,则会降低或削弱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认同。这主要是因为执政体制实质上规定了执政党作为国家一切政治权力的实际源泉,因而执政体制的性质和功能的定位进而还包括其客观作用、效果,从根本上都会影响到民众对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判断和认识。

(二) 组织机构

所谓组织机构^②,是指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的目标在分工与合作下不同

^① [美] 埃里希·弗洛姆:《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② 组织的定义有三种方式:一是“结构论”,这种观点认为,组织要有不同层次的权力与责任制度;二是“行为论”,这种观点认为是两人或两人以上有意识加以协调的活动或效力系统;三是“系统论”,这种观点认为,组织是开放的社会系统,具有许多相互影响共同工作的子系统,当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时,必然影响其他子系统和整个系统的工作。本文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组织的定义。

层次的权力和责任制度的集合。组织机构是国家统治和社会管理的真正实施者。在中国,组织机构包括党组织、政权组织、群众组织、民间组织等在内的各种组织的集合。从党的执政基础来看,组织机构的作用表现如下。

(1) 组织机构是执政党政权运行及其权力行使的载体。任何政治活动都要靠组织机构来推行,虽然执政体制是执政党政权运行及其权力的保障性力量,但是,这种保障性力量要转化为实际政治运作中执政党政权运行及其权力行使的巨大能动性,必须通过组织架构。正如彼得·德鲁克指出的:“社会已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社会任务是在一个组织里和由一个组织完成的。”^① 反过来,如果没有设立必要的组织机构,权力就无法运行。因此,组织机构和政治权力之间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

(2) 组织机构是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等政治功能的承担者。按照阿尔蒙德的观点,在现代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每个组织都是一个具有明显政治目的的结构,它们通常都履行多种功能。^② 首先,政治社会化功能。在阿尔蒙德看来,“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政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③ 这些结构或是专业化政治机构,譬如国家、政党等组织,或是非专业化政治机构,譬如家庭、教会等组织。执政党所控制的大量政治资源总是试图通过其所控制的党组织、政府、学校等机构以各种社会化方式,形成社会成员对待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态度。因为“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化连续性很高,并且不断得到加强,那么他的态度就会呈现出高度的稳定”。^④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党的执政基础而言,组织机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次,政治录用功能。执政党对干部的录用和控制,是政党政治的通行法则。特别是在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期间,如果新的社会团体(阶层)在过渡时期或至少在它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不

① [美] 彼得·F. 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② 参见[美]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小G. 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5—56页。

③ 同上书,第83页。

④ 同上书,第85页。

能进入现有的政治体系,那么,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将有可能出现。^①因此,“大多数现代的政治体系都具有专门的组织和机构,通过录用功能来管制其他政治角色的行为”。^②执政党更是如此,它必定通过其所控制的组织机构来选用人员,以确保其骨干力量的新陈代谢。

(3) 组织机构是执政党控制和治理国家、社会及组织成员的中介。组织机构通常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权力分配,个体成员一旦进入一个新的组织体系,上级的各种指示便随之而来,如影相随,譬如学习文件精神、指示命令或某种社会团体的章程等。因此,加入组织意味着个体成员要承担一定的组织义务,遵从组织的相关规定以及自上而下的上级权威性的控制。在借助组织维护自身个人利益的同时,个人必须向组织及其上级表示支持或忠诚,让渡部分个人行动的控制权。正是通过这种组织网络的控制,执政党才能实现自身组织系统与社会的紧密结合,从而在自身组织系统的基础上,将社会有效地凝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国家、社会及组织成员的控制和治理。

综上所述,政治权力的运行、制度的安排、政策的制定等,都离不开一定组织机构的持续运转。对于党的执政基础而言,组织机构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三)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③,指的是政治系统的输出部分。付诸实施的政策输出主要包括资源的提取、产品和服务的分配、行为的管制、象征和信息的交流,等等。^④在这里,我们强调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在涉及政治、经济、文

① 参见[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②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③ 同企业组织、民间组织所制定的一般政策相比,公共政策的特点是“公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为宗旨;(2)价值目标是公众利益和意愿的综合;(3)在民主政治的运作中完成政策制定的过程;(4)由法定的公共管理组织系统贯彻执行;(5)接受公民社会的监督和批评。参见郑敬高主编《政策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④ 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化、社会以及环境等系统的一系列行为,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反馈,它们依靠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去贯彻落实。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来看,公共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政党、政府等政治主体都有其政策上的特点,人们可以根据不同政策重点来分析这些政治主体。如果我们不把政策的观念运用于执政基础的分析,那就势必忽略了政治的大部分内容。

(1) 公共政策的制定体现执政党不同倾向的价值选择,决定着不同阶级阶层的支持认同程度。随着社会分化为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阶级阶层,各阶级阶层在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上有着诸多不同。受特定历史情境、社会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影响,执政党势必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这种选择的结果就是公共政策。它不仅影响着社会价值在不同阶级和阶层中的权威性分配,而且也反映出不同阶级和阶层对特定社会问题的关注,包括关注内容及程度。譬如,社会的弱势群体希望公共政策有利于自己公平的意愿,社会的强势群体也希望公共政策有利于自己效率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政策体现出执政党所希冀获取的不同阶级阶层的认同和支持,因而其所蕴含的价值选择也得以实现。

(2) 公共政策的结果,即政策输出在实践中的绩效(或有效性)深刻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度。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公共政策的结果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政策的制定、实施到实际成效的取得,这一过程中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违背政策本身的意图,甚至走向反面。美国公共行政学者艾利森曾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则取决于有效的执行。”^①如果公共政策的绩效高,就说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及其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也意味着公共政策能够实现和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此,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就高,执政基础就巩固。相反,它的合法性就越低,执政基础就越不牢固,甚至可能丧失执政地位。正如李普塞特所说“如果有效性一再丧失,或长期丧失,则会危及一个合法系统的稳定性”。^②

① 转引陈标等《试析公共政策执行失灵》,《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②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3) 公共政策的反馈决定社会公众对执政党执政的支持储备程度。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必须关注反馈的作用。执政党通过公共政策为巩固执政基础所作的努力,无论效果如何,都通过反馈作用,对新一轮的输入和政策制定产生影响。譬如,随着房地产、教育、医疗等领域政策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消费群体表达进一步加强政策制定和调整的要求。在整个政策实施过程中,人们通过反馈连续不断地发出各种要求和支持,从而影响执政党新一轮政策的制定。人们不断形成新的政策态度、新的对于执政党本身的积极或消极看法,执政党能应对人们新的态度进行自我调整,会进一步影响执政基础的持续巩固。综上所述,任何政党、政府等政治主体都有其制定政策的价值取向,人们便根据其政策取向及实施的绩效,作出是否支持认同的判断。

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决定我们党的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和终点始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党的公共政策事实上也能涵盖所有社会成员的需求,或者通过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主导社会资源的分配。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确立了人们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存在,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力量正在兴起,这使得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的决策成本增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决策中枢系统超负荷了。可以说,由于多元利益冲突和矛盾,特别是不同利益群体追求利益的相互博弈,当他们的力量向不同方向伸展时,党的公共政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失灵的困境,其政策后果的不确定性增加。换言之,这就意味着普通民众对政策的认知不够,感受不到公共政策与自己利益的相关性,便会采取抵触行为,或者用一种冷漠的心态对待政策。没有目标群体支持参与的公共政策无疑是失败的,因而党的执政基础受到影响也是在情理之中。

二 观念形态维度: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

如果说制度形态维度是阐述执政基础的有形和刚性的力量,那么观念形态维度则是执政基础的无形和柔性的力量。在这里,观念形态维度主要

是指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它为中国共产党有效增强其执政基础提供价值性、心理性支撑和良好的思想、舆论、社会氛围。

(一)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在这里指的是政党、群体或者其他团体组织用来解释政治系统和政治秩序应当如何运作的一套观念与原则,并且提供了这些政治秩序的蓝图。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而意识形态则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①对于党的执政基础来讲,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表现如下。

1. 合法性论证的功能

一种政治秩序能否得到有效维护,取决于是否为人们所承认,而是否为人们所承认,又依赖于它是否被证明是合法的。哈贝马斯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合法性论证的力量,若非如此,将出现执政合法性危机。^②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是如此,它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执政基础能否得到巩固,首先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论证功能。作为意识形态来讲,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为执政党提供合法性论证。

首先,论证其社会制度和权力支配的合法性,以赢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因此,“任何统治阶级都要在意识形态上论证其社会制度和权力支配的合法性,并用这种合法性去限制排斥甚至清剿妨碍该社会制度和权力支配的其他意识形态,设法证明其他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的不合法性”。^③其次,论证其政治行动的合法性。对于执政党内部成员来讲,意识形态可以使其成员确信它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是正义的,是合理、合法的,进而要求其成员采取一致行动,为实现它的政治行动而努力;对于执政党外部的人来说,意识形态可以使社会成员相信它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是合法的、合理的,这样就可以赢得社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从而减少其政治行动的社会阻力。“意识形态能够为政治集团及其政治行动提供逻辑上的合法性”,^④原因就在这里。

① 参见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② [联邦德国]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③ 郑永廷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④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2. 政治动员的功能

意识形态并不是直接产生政治动员的作用。但是，当它通过宣传、灌输，从抽象的理论领域来到民众的头脑和实践范围，就会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的物质、精神以及心理上的力量。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功能：首先，激发执政党成员的政治信念和行动热情。意识形态通过阐明共同信念与奋斗方向，将聚合心理转化为统一行动，达到执政党有效的动员目标。同时，它也能够通过强调长远利益，使其成员自愿牺牲短期利益。可以说，没有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动员，没有长远利益的吸引，这一点是根本做不到的。其次，动员所有社会成员为实现执政党的纲领、路线、政策与目标等而奋斗。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处理的是这样一些社会运动，它们千方百计动员人们为实现这些信仰而奋斗。”^①

3. 社会认同的功能

作为意识形态来讲，它的生命力来自对社会观念和价值的有效反映，不断把形成社会共识的观念和价值吸收到意识形态体系中，才能避免僵化，同时增强对社会公众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这也即是社会认同的功能，主要表现在阶级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方面。

首先，就其阶级功能来看，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理论反映，它通过反映与之地位相似的人们的愿望，阐明群体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使每个成员从中体会到个人与阶级、个体与群体间休戚与共的关系，从而唤起阶级阶层成员强烈的聚合心理。其次，就其社会功能看，通过意识形态社会化，意识形态可以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进而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在现实社会中，任何统治阶级为了达到有效控制和管理社会的目的，就必须尽可能多地争取人们的支持。因此，它在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必须同时兼顾社会上其他阶级的利益。这也决定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反映本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必须同时反映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中具有指导性地位，为我们透过复杂的社会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装。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而言，最有效也是最为根

① [美]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6 页。